

# 話語結構中的權勢隱含

晏小萍

摘要：本文基於電視心理諮詢的真實語料，用語言學談話分析的方法，考察機構角色、話語角色，話語結構中的話輪轉換，相鄰語對等特徵與之內含的話語權勢的關係。通過微觀層面的分析，本文指出“心理訪談”有別於一般的日常會話，它是一種具有非對等權勢關係的談話活動。話語權勢不僅可以從上至下地實施，且可以通過特定的話語構架隱含其中。這種話語權勢通常不被人們察覺，但它卻駕馭著人們的言語行為模式。

關鍵詞：話語權 談話分析 機構話語

## 一、引言

對話語權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範疇。然而，宏觀上的研究未必能揭示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的語言互動中的話語與權力的關係實質。本文運用現代語言學話語研究的方法，從微觀話語交流的互動模式中，探索語言與權利的關係。這種以語言應用研究為切入點，對話語與權利關係在話語交流的動態下進行微觀的分析，旨在認識特定的機構談話活動裏，話語權勢如何通過話語結構得以實施、表達、掩蓋和認可的。

在進行文本分析之前，讓我首先就話語分析理論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 二、談話分析理論

談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始於20世紀60年代。當時Sacks, Schegloff, Jefferson等語言學家嘗試以真實的會話錄音材料為基礎，對日常會話規律進行歸納和總結，試圖以此探索社會學研究的新思路和方法。它的理論基礎源於社會學家 Garfinkel的民族分析法理論(ethnomethodology)，其研究性質以定性分析為手段，擯棄過往那種在分析足夠的語料之前就對結果做出先入為主的判斷。談話分析研究方法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運用真實語言材料研究人們的社會活動。該研究方法以日常真實會話為基礎，對特定場景中人們交談規律和模式的揭示，比如話輪更換、相鄰語對、連環秩序、理想答話結構等研究，以揭示語言運用的內在規律。然而，任何語言應用的研究必然與社會文化的種種因素息息相關。話語構架，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活動構架的顯象性表現形

---

晏小萍，香港浸會大學英語系博士候選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式。因為，言之所達，言之所為，言之方式的選擇都與社會情景、語言環境、心理認知等因素密不可分。而談話分析的成熟理論為分析研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描寫手段。

自90年代以來，談話分析法被廣泛地應用於心理學、社會學、大眾傳媒、婦女研究學等學科領域，(Pomerantz 1984；Schiffirin 1985；Seligman 1996；Shuy 1983；Silverman 1997；Thornborrow 2002；Zimmerman, D. & C West 1983)，它已經成為諸多學科通過研究談話秩序，揭示社會活動現象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本研究也將以談話分析法為分析手段，通過對特定場景中話語框架，話語規則秩序的分析，以期揭示心理諮詢這一特定機構場景中的話語結構的特徵。

### 三、研究目的

在中國，電視心理訪談是一種很新的話語形式。雖然，電話心理諮詢服務起始於80年代後期(錢銘怡，1994)，然而這種具有高度私密性的談話活動，將諮詢者和心理學專家面對面的談話以電視節目的形式公示在觀眾面前，還是近一兩年的事。這種特定談話場景和內容將會產生何種話語結構形式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本研究旨在通過對心理談話的話語結構特徵的描述，探索心理訪談與日常談話，在話語結構上有甚麼不同？話語權通過何種話語結構得以體現？

該語料採自2005年2月至2005年9月中國中央電視台12頻道“心理訪談”欄目的節目錄音。該節目由主持人、心理學專家和心理諮詢者三方組成的交談式會話活動，演播廳沒有觀眾出席。然而，電視心理訪談的特質決定了談話活動將被電視觀眾所關注。因此，談話活動雖然在主持人、心理學專家和心理諮詢者三方之間展開，但是，談話的指向必定超出演播廳的範圍。語料中的每一期涉及一個案例，剪輯成20分鐘，12次訪談共計時240分鐘。

樣本選擇的原則主要考慮錄製效果的清晰度、一期談一個案例、談話參與者的性別比例等因素。本研究語料中組成的被試對象是：主持人2人，均為女性，心理學專家6人：男性3人，女性3人，諮詢嘉賓16人：男性8人，女性8人。

### 四、分析結果

“訪談”，是一種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的策略性機構式談話。核心要素“問題”貫穿整個談話過程，而解決“問題”是談話交流的最終任務。我們看到諮詢嘉賓帶著個人工作、情感上種種困惑來到“訪談”節目，尋求心理學專家的指導和幫助。心理專家通過探索，診斷“問題”，最終目的是減輕諮詢者的心理負擔和種種壓力，改變認知，解決問題使其更好地面對人生。主持人則是談話活動中的協調者，她把握著談話的進程和方向，協助專家進行心理諮詢和輔導工作。在整個心理諮詢的過程中，語言交流是主要的手段。“訪談”雖然話題各異，來訪者背景和文化水平也不盡相同，但“訪談”的總體結構卻呈現出3個環節：(1)訪談起始，(2)“問題”談話，(3)訪談結束。

“訪談”開始階段和結尾階段都十分簡短，佔總談話時間的十分之一。而與“問題”談話佔總時間的十分之九。本研究將討論心理訪談中的核心部分“問題”談話的話輪分配，相鄰語對，機構角色，話語角色與話語權力的關係。

### (一) 話輪分配

所謂話輪，指談話人得到的一次說話機會 (Sacks et al., 1974)。日常談話中的話輪規律表明，當談話參與者擁有著相同的權利而從事談話活動時，談話各方應該擁有同等的話語權，比如說，有同樣的提問權利或答問的義務。其話輪更換的常規模式為：

- 1) 講話人不選，其他人自選：誰先說話，誰獲得發言權；
- 2) 講話人不選，其他人也未開口，講話人可以繼續講，也可以等待；
- 3) 一旦第二個人開始說話，以上幾條規則重新生效。(Sacks et al., 1974)

上述日常談話中總結出來的常規形態，在“心理訪談”中是否得以呈現？如果不是，它們的話輪更換和話語結構又有甚麼樣的特徵呢？

資料統計顯示話輪共1865個。平均每次“訪談”大約由132個話輪，5500多字組成。談話參與者三人各佔話輪次數比例，見表1。

表1 談話人的話輪分配

	總計	諮詢嘉賓	心理學專家	主持人
話輪	1865次 100%	715次 38%	590次 32%	560次 30%

從話輪分配比例來看，諮詢嘉賓、心理學專家和主持人的話輪次數接近，分別為38%、32%、30%。而且，僅從話輪分配的比例來看，諮詢嘉賓的說話機會相對多於心理學專家和主持人，而心理學專家和主持人的講話機會幾乎平分秋色。

### (二) 相鄰語對

相鄰語對 (adjacency pairs)，顧名思義，指談話中彼此相鄰，有某種特殊關係的兩句話。例如，提問的相鄰語對就是回答，邀請的相鄰語對是接受/拒絕，道歉的相鄰語對是接受/拒絕道歉。Sacks (1974) 等人指出相鄰語對的特徵除它們在順序上有特定的先後外，還有以下特點：出自兩個不同的講話人；講完了第一部分的人必須停止講話，第二部分的答案受到第一部分對話的制約。雖然，在某些時候，第二部分的答案可以有多種選擇的形式，比如，對第一部分的提問，第二部分可以正面回答，也可以回避，甚至拒絕回答，或答非所問。但是，勿容質疑，第一個人有權選擇下一個說話人，並且對第二部分講話內容都有較強的期待性和制約性 (Sacks et al., 1974)。

文本分析顯示，“訪談”中的話語結構秩序的相鄰語對結構主要呈現出一種鏈條式問-答的對話模式。下例中，箭頭所示之處均為相鄰語對的第一部分。

## (1) 諮詢者: 男; 36歲; 錄音時間: 030405

- 1 主： 你在做的這件事情看上去是很輝煌，很光榮的事情，為甚麼現在會有打不起精神來的感覺？你的那種真實的困惑是甚麼？
- 2 賓： 我的那種真實的困惑是，我那些活動吧，需要家人的支持，特別是我愛人的支持，但是呢
- 3 主： 那你跟你妻子在這件事情上，實際上是存在一些分歧，是吧？
- 4 賓： 肯定的呢。一個人的工資三個人花，吃喝住行這些花銷都得她一個人承擔，她經常就說，別搞那些不現實的東西，趕快上班，趕快有點收入
- 5 主： 既然這件事情給你帶來了困惑，而這件事情本身又不是說養家糊口我們不做它就會餓肚子，那是不是可以放棄這個行動？
- 6 賓： 既然做這個喜歡做的事業，我就想往前走。我不是說無休止的這樣走下去，就是有個框框，三年左右吧之內，身體允許的情況下，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去搞這些活動。
- 7 專： 你真能夠鑒定你做極限運動是為了刺激還是為了別的需要？
- 8 賓： 嗯，一開始是為了刺激。
- 9 專： 現在呢？
- 10 賓： 我覺得是一種責任。
- 11 專： 甚麼責任？
- 12 賓： 去年夏天，一個外國人來游長江，
- 13 專： 嗯，(鼓勵嘉賓繼續話題)
- 14 賓： 我心裏就挺彆扭，我們自己的長江，我們這麼多游泳愛好者，怎麼他要先游，先和後他就不一樣。
- 15 專： 對。(不新鮮了，) 是吧
- 16 賓： 對。
- 17 專： 現在(你妻子抱怨)你參加這些極限運動打亂了家庭生活的規律，在教育孩子啊，在負擔老人方面，都是妻子一個人承擔了，在這方面有抱怨嗎？
- 18 賓： 就是吵架
- 19 主： 從你的情況來看，一方面你是覺得游泳這件事情確實影響到家庭的生活，對吧？作為一個男人來說，養家糊口的這個重任沒有承擔下來。另一方面你又希望妻子能夠支持你，其實這兩個都是很難統一的。
- 20 賓： 本身就是很矛盾，有句話叫攘外必先安內嘛。自己的家庭不穩定，不統一，你總不能成功發展，所以我挺困惑的。

上面的對話中，我們看到，談話人之間有三種相鄰語對的形式：

第一種：主持人提問，由嘉賓回答，如話輪1-6所示。

第二種：專家提問，由嘉賓回答，如話輪7-18所示。

第三種：主持人和專家相繼提問，由嘉賓回答。如下例：

(2) 諮詢者：男/女30歲；錄音時間：022005

63	專：	那現在你保持60%是維持你們良好的關係。
64	賓：	對，我記得只要，尤其是夫妻嘛，大家經常在一起的話，我如果想維持這種關係更久一些的話，那我就希望能跟她保持，適當保持一點距離，（主：嗯）如果太過於親密無間的話，每個人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67	專：	小徐能理解嗎？小徐能理解嗎？
68	主：	那你是有意識去這樣做嗎？
69	賓：	對，我有時候會去這麼做。

在這三種形式中，不管何種形式，相鄰語對的第一部分總是由主持人、專家把握，他們二者總是提問者的角色。與此相反，相鄰語對的第二部分總是由諮詢者承擔，即答問者的角色。對整個“訪談的話語結構分析的結果顯示，問答連環秩序話輪佔71%。而通過對資料中相鄰語對中的第一部分，談話人各自擁有的次數進行量化分析，三人所佔的比例如下表2所示：心理學專家和主持人提問比例分別為51%，44%。諮詢者提問的機會只有4%。

表2 12次訪談中相鄰語對裏的第一部分的分配比例

訪談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Total	%
提問	40	58	41	53	38	62	43	53	54	60	54	21	578	100%
主持人	15	28	25	27	24	32	18	34	31	35	16	11	296	51%
專家	24	24	16	26	14	30	23	16	17	23	35	9	257	44%
嘉賓	1	6	0	1	0	0	2	3	6	2	3	1	25	4%

上述極不平衡的話語構架現象到底能說明甚麼樣的問題呢？我們將在下面的部分進行討論。

## 五、討論

### （一）機構角色與話語角色

心理訪談有別與日常會話，它是一種比較正式的談話場景中的語言交流形式，並以完成某項機構特定任務為目的的機構會話(institutional talk)活動。此種交談的活動一般在具有專業知識和非專業知識的人員之間展開（Drew & Heritage, 1992: 3）。Habermas (1984) 將其稱為“策略性談話”（strategic discourse），以此區別於日常交流的“交際性談話”（communicative discourse）。所謂“交際性談話”，就是指談話者不需要具備專門的知識系統，只需要懂得談話活動中最基本的原則和規律（Goffman 1981），譬如，談話人平等交流的機會，話輪替換的基本規則等。策略性談話與日常談話的區別在於前者常應用於機構會話的正式場景中，以完成任務為目的的談話活動中。

由於機構談話場景中所包含的上述特質，因此，它也就賦予了談話參與者不同程度的話語操控權和話語權力的局限性。由於特定的語言環境和角色身份的限定，談話者往往會把自己置於，或者被對方置於一個特定的地位和角色之中。正如 David Silverman (1997)指出，在機構談話過程中，談話各方擔當著兩種不同類型的角色。一種是機構會話賦予的特定職能性的機構角色( institutional role )，比如，在課堂教學中老師或學生的角色；在商務談判時買方和賣方的角色；在求職面談中應聘者與主考官的角色。由於機構角色的定位，談話參與者事先在某種程度上被賦予了某種特定的話語權力。第二種是談話交流中的話語角色( discourse role)，比如，提問者的角色或答問者的角色。在機構會話中，人們的言行舉止是他們機構角色身份所要求下的話語活動的產物。換句話說，機構角色和話語角色在一定的程度上決定著談話人話語權的大小。

鑒於機構角色和話語角色對會話參與者擁有的話語權力的大小的控限特徵，下面的研究將對參與談話活動的三方，諸如主持人、心理學專家和諮詢嘉賓在會話活動中言語行為進行微觀層面的分析，旨在探索在這種諮詢機構話語場景中，話語結構和談話人所擁有的話語權勢的關係。

## (二) 話輪分配與話語權

如果權勢與話語權的大小成正比的話，即誰的權勢大，誰就擁有更多話語表達的方式；誰的權勢越小，誰就會受到話語權的限制，得到較少的講話機會，那麼，我們可以推測，一般地說，話語權的大小與一個人得到的話輪多少成正比。分析結構(表 1)意味著諮詢嘉賓在談話中擁有相對多的講話機會，換句話說，在這種電視心理諮詢中，諮詢者、非專業人員在話輪的掌控上有較大的述說空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一種新的，解放性的，談話各方較為平等的話語交流形式。

然而，話輪分配比例經過進一步的相鄰語對的微觀分析，又為我們展現出話語結構與權利關係的另一個層面。從宏觀的機構話語場景的權勢分配而言，主持人、心理學專家和心理諮詢者在該心理諮詢場景中分別被置於不同的機構角色的框架之中，談話伊始，他們各自也就被設定在相應的話語權力範疇。雖然，對各自的話語權勢的劃分沒有明晰的規定，但當談話各方身處具體的情境之中時，各自享有的話語權力和履行的義務就會有基本的共識。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談話參與者對話語權勢的分配和話語中所將遵循的規則和秩序規則事先已經有了某種默契。正如 Fairclough (1995)指出，話語交流的範式是由意識形態的話語結構決定的。具體地說，話語交流中的秩序是建立在人們對世界的共有的認識基礎上，建立在人們相互認同並期待行使的秩序規程上。

由此可見，在心理訪談中，談話三方對談話活動擁有的共識為：諮詢嘉賓心有困惑而來到“訪談”節目尋求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他們的機構角色是心理求助者，對心理學的知識瞭解甚少，在談話中基本處於劣勢。心理學專家的機構角色是為諮詢者發現心理問題，提供心理上的指導和幫助，以期解除面臨的困惑。心理學專家所擁有的特定的知識系統，學識地位決定了他們在談話活動中擁有相對而言較大的話語權勢。心理諮詢中的第三方是主持人的角色和地位，在談話活動中，主持人協助心理學專家、

諮詢者完成一系列的話語活動。她指揮、調控談話的方向、談話的進程和節奏等，掌握談話的開始和結束的話語權。由此可見，談話參與各方分別被置於不同的角色和地位之中，機構角色的定位，決定了他們在談話活動中擁有相對較大或較小的話語權勢。

那麼，在本研究場景中，甚麼原因導致權利大的機構角色反而得到較少的話輪機會呢？筆者下面將從話語角色的角度入手，分析話語結構，探談話人各自在擁有的話輪中到底說了些甚麼，以期揭示話語與權利的內在關係。

### （三）相鄰語對與話語權

上面我們已經提到，從話輪分配比例來看，諮詢嘉賓、心理學專家和主持人的話輪次數接近，分別為38%、32%、30%。也就是說，他們的講話機會基本平衡。但是，這種看似平等的後面，通過對相鄰語對的考察，揭示著某種不對等的話語結構現象。心理學專家和主持人在心理訪談中的話語角色主要是提問者，他們各自的話題比例分別為專家44%，主持人51%，而諮詢嘉賓只佔4%。（見表2）。因此，諮詢嘉賓完全處於回答者的角色，他們的話題機會，總是在被提問後，才有機會提供信息。即使他/她不同意心理學專家或主持人的意見，辯駁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主持人的問話比例高於專家，是因為她們代替諮詢人向專家提了一些問題。由此可見，諮詢嘉賓雖然擁有同樣的話輪數量，甚至較其他兩人更多的發言機會，但他們的話語角色在整個談話中總是被置於相鄰語對中的第二部分，總是處於答問的位置。在某種意義，他們是“被動”的說話者。所謂“被動”，是因為他們擁有較少的選擇話題、轉換話題或控制話題的權利。這種偏離日常對話中平等機會話語權模式的現象，說明了機構話語場景中的權勢和話語角色有著密切的關聯。談話參與者言語行為在各階段的話輪比例和重復出現的話語結構模式，正是非對等的機構談話場景裏一個顯著特徵。

這種非對等權勢的機構談話與話語權有甚麼關聯嗎？Sacks (1995, Vol.I:49)指出，提問人在談話中通常處於操控權力的位置。相鄰語對的理論指出，現時說話人在他的話輪裏所說的話語與他/她所選擇的下一輪說話人的話語一起構成了一個相鄰對。第一部分往往選擇下一話輪的說話人，而且總是選擇下一個人的言語行為。比如，一個人如果位於提問的話語角色，他的提問實際上對第二部分有所牽制和期待，第二部分一般需要對第一部分的提問做答，這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就喪失了部分話語主動權。

## 六、結語

本文運用話語分析方法對“心理訪談”的談話實例的微觀分析發現，第一，“訪談”，有別於日常對話，它是一種典型的非對稱權力的機構場景式的談話活動。與日常生活中的談話的區別在於，70%以上的話語秩序屬於問答連環秩序，其相鄰語對為典型的提問-回答形式。第二，談話參與方非對等的話語交流結構是通過機構角色的定位和話語角色的構架予以實施和操控。此種權勢在話語中具有隱含性的特質，通常不被人們察覺而是想當然地接受和認可。第三，心理諮詢，這樣一種極其私密性的談話類被置於一個公眾觀看的電視平台，這一談話形態本身的出現，從宏觀的角度

來看，是一種反傳統情感交流模式的新型話語形式。它代表著一種解放性的話語形態正在後現代文明的社會交際中產生。雖然，通過對話語結構的微觀分析，“心理訪談”，是一種典型的非對稱權力的機構場景式的談話活動，話語權隱含於話語結構之中。作者想要指出的是，話語權多少的分配並非完全是一件消極的事。在特定的中國社會文化環境背景下的心理諮詢類的談話活動中，專家在解決問題時顯示知識的權威性，對心理和情感問題的處理和干預，筆者認為，它或許有其正面積極的作用。高一虹（1999）在探討心理諮詢的宏觀語境對文化傳統與文化變革權的問題時也談到了權威在傳統的幫助模式中的地位。機構談話中話語權的存在和使用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和評判。當然，此乃筆者的管樞之見，有待於同行從不同學科和不同角度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

#### 參考文獻

- (1) Clayman, S. & Heritage, J. (2002). *The news interview : journalists and public*
- (2) Erickson, F & Shultz, J. (1982). *The counselor as gatekeeper: social interaction in interview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3)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Harlow, Essex: Longman.
- (4) Goffman, E.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5) Goody, E.N. (1978). Towards a theory of questions. In E. N. Goody (Ed.),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pp.17-4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Habermas, J. (1984).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London: Heinemann.
- (7) Pomerantz, A. (1984).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with assessments: some features of preferred/ dispreferred turn shapes. In M. Atkinson &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 (8) Sacks, H., Schegloff, E. A., & Gail, J.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4, 696-735.
- (9) Sacks, H. (1995).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In G. Jefferson (Ed.), Vol: I and II. Oxford: Blackwell.
- (10) Scheflen, A. (1973). *Communicational structur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1) Seligman, L. (1996).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ning in counseling*. New York : Plenum Press.
- (12) Shuy, R.(1983). Three types of interferences to an effect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the medical interview. In S. Fisher & A. D Todd (Ed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pp.17-30).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Press.
- (13) Silverman, D. (1997). *Discourses of counseling: HIV counseling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 (14) Thornborrow, J. (2002) *Power talk: language and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England: Longman.
- (15) Zimmerman, D. & West, C. (1983). Sex roles, interruptions and silences in conversation. In B. Thorne et al (Eds.), *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 (pp. 105-29). Cambridge: Newbury House.
- (16) 高一虹，文化傳統與文化變革權：確指導性心理諮詢的宏觀語境，《北京大學學報》（外國語言文學專刊），1999。
- (17) 錢銘怡，《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 Power Embedded in Discursive Structures

Yan Xiaoping

Abstract:

Based on real life dat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discursive structures and discourse power in a ‘therapeutic’ Chinese TV talk show in the light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 Through a micro analysis of turn-taking allocation and the recurrent patterns of adjacency pairs,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and discourse role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therapeutic conversational encounter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ystem of speech exchanges in the talk-show therapy, unlike that in the everyday conversation, has its own peculiar discourse features. Participants have a set of routine restrictions and allowable contributions which are assigned to them respectively in the conversational encounters. The researcher poses the suggestion that power in conversation can not only be implement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roles but also embedded in certain discursive structures.

**Key Words:**

Power, Conversation analysis, Institutional talk